

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

宁 欣

内容提要：“场”作为唐朝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现在常说的“市场”，其实属于集合型名词，至少在唐朝，“市”与“场”还是两个概念，空间范围所指也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本文探讨的“场”所具有的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市”与“场”的结合、“逢场作戏”成语的出现正是城市从士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过程中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拓展的反映。

关键词：逢场作戏 市场 城市公共空间 唐宋城市社会 市民

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是唐宋城市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和拓展对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长是很重要的。

众所周知，唐朝长安城的空间布局是统治者城市建设理念的典型代表。三重城中的外郭城，规划的坊市格局，有三个空间区划，一是居民区——坊，二是商品交易区——市，三是道路通行区——街道，普通市民的社会公共空间并没有在城市规划中体现。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普通居民的社会公共空间的需求必然逐渐显现，这一需求基本集中在大型宗教、文化娱乐及与社会生活有关的群体活动方面。^①

我们现在常说的“市场”，其实属于集合型名词，至少在唐朝，“市”与“场”还是两个概念，空间范围所指也是两个不同的区域。以往研究唐代城市社会空间，主要关注坊与市，近年也注意到街的作用^②。以长安城为典型，“市”主要指东西两

^① 群体性的政治活动空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也不可能开拓有余地，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② 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

市^①，“场”有多种含义。“市”和“场”最初都是作为专有名词而使用，分别指特定的空间。“市易”与“开场”同时也在同一场所进行。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市”与“场”的结合形成了“市场”这一集合名词。不过，“市场”正式成为一个固定名词，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成为我们今天意义的“市场”，更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我们讨论过街的公共空间职能^②，与街类似，城市中（包括近郊）“场”的公共空间职能也容易被忽略。“街”与“场”的结合、“街”与“市”的结合、“场”与“市”的结合，是唐朝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随着市民阶层的成长^③，原有的官方场地和宗教场地逐渐面向大众，市民阶层也通过种种努力和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拓展着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并使它们逐渐向常年化和固定化发展。

一 场的含义和类型

我们对“市”的关注比较多，近年的研究和认识也更加深入^④。相反，对“场”的注意不够。其实，“市”与“场”之所以最终走到一起，并非偶然。场，一般意义上是指一片开阔的场地。但在利用其进行某些活动时，就有了特定的职能和新含义。

场的几种类型：

1. 政府控制的场地。可用做堆放物资的场所，如附属转运仓的输场、草场、柴场；或军队训练的场所，如教弩场等。《通典·食货典》记载：“从含嘉仓至太原仓，

① 唐朝曾一度在安善坊设置南市（中市），旋废。《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2页）卷七“安善坊”：“尽一坊之地为教弩场。注：隋明堂在此坊。高宗时，并此坊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已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后但出文符于署司而已，货鬻者并移于东市。至武太后末年，废为教弩场，其场隶威远将军。”或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此外，芳林门南还有曾设过新市的记载，《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又置新市于芳林门南。”（第160页）太仓紧邻之，应该是官府选择置场的较佳位置。修德坊西南隅为兴福寺，“院宇极壮丽”（《宣室志》卷一〇《兴福寺十光佛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因此，开场，设市，做斋会，都应该有足够的场地。《长安志》卷七“芳林门”，注云：“元和十三年，两市百姓于芳林门置无遮僧斋。”（第84页）《旧唐书》卷六四《楚王智云传附灵龟传》：“灵龟，永徽中历魏州刺史，政尚清严，奸盗屏迹。又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23页。

② 参见《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③ 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有不同说法，但都不大明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普遍兴起。唐宋时期应该是市民阶层萌芽和形成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不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市民进行简单的比附，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关于中国古代市民研究，参见吴铮强《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④ 侯旭东对“市”的研究和认识都有新的见解，可参《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2—306页。

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① 这是附属转运仓的场。由于交易活动经常在场举行，城郊附近的仓场逐渐发展为经常性的官民物资交易场所。

2. 政府利用公共空间的赈济、余粟、兑换恶钱或公益举措称开场、作场。玄宗天宝十三载（754），“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粟以济贫民”^②。这是粟场恤民。还有开兑场以宜轻重。粟场或钱场，开场规模都不小，开场地点除两市之外，往往还专门下诏“择便要处”做临时性开场场地。开场时粮食往往在几十万乃至百万石，钱币便换亦达数十万贯，所选场地应该有一定的空间。有记载的是玄宗天宝十一载（752）二月，“龙兴观南街开场^③，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恶钱^④。再如东渭桥是江淮、河东、河北粮物运往京师水陆转运地，位于万年县北五十里，灞、渭二水交会处^⑤，“车者如户，舟者如徼”^⑥，也经常作为官府选择的开场之所。陆贽曾建议在“京城内及东渭桥开场和余米二十万石，每斗与钱一百文，计加时估价三十已上，用利农人。其米便送东渭桥及太原仓收贮，充填每年转漕四十万石之数”^⑦。

3. 举行宗教活动的称谓，主要指道场等。由于祭祀活动往往在固定的场所举行，如寺庙、宫内等，开始作为道场，是宗教活动场所，因为聚集了很多信徒且流动频繁，后来演变、引申出其他功能的场，成为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4. 官方设置的运动场所，如球场、鞠场，但并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5. 戏场。城市居民的真正娱乐场所是“戏场”，我们在史籍中看到的“场戏”^⑧，指的就是利用“场”的空间进行的艺术表演。

6. 非指固定场所，而是代指人们活动的空间，如战场、道场等。

这些实有的“场”和临时指定的“场”，在城市中心区和城市周边地区，不论是官方有意设置还是民间自然形成，往往被民众开辟或利用为开展经济往来和娱乐活动的公共空间。市中有场，场外有市；利用市开场，利用各种场活跃市，固定的市和临时的场，逐渐结合趋同，市与场的作用就逐渐合一了，市与场的含义也逐渐合

① 《通典》卷一〇《食货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4页。

②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229页。

③ 长安城内崇化（教）坊、永崇坊内都有龙兴观，务本坊内的先天观在天宝八载（749）至至德三载（758）期间名为龙兴道士观。关于永崇坊内龙兴观的记载都是贞元末年及其以后的。所以，天宝十一载时的龙兴观，当很可能是指前两者，或其中一个。

④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099页。

⑤ 《雍录》卷六《东渭桥》，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6页。

⑥ 李观《东渭桥铭并序》，《全唐文》卷五三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5341页。

⑦ 《陆贽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97页。此建议究竟实行与否，尚待考证。

⑧ 有人认为“戏场”在早期汉译佛典中也有虚指的含义，见康保成《“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一了。

二 唐长安的戏场

戏场的设置和开辟,从临时走向固定,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是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拓展的重要表现。

“戏场”一词出现较早,汉朝已见使用^①。“戏场”在隋唐时期有一个从不固定到相对固定、从少数上层娱乐场所走向民间的过程。

隋唐时期的“戏场”主要有几种形式:

1. 官方为庆典和娱乐专门设置的“戏场”

《隋书·音乐志下》:“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②这是官方为庆典专门设置的戏场,是在洛阳主要街道上安排的表演。再如,张祜《千秋乐》诗云:“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③描述的是皇上与民众同乐,将花萼楼下开辟成临时戏场的场景。《开天传信记》载:“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踰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④上述的“戏场”都是临时性的。勤政楼和花萼楼下之所以能被辟为君民同乐的“戏

① 康保成《“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一文中,认为“戏场”一词出现于汉译佛典《修行本起经》,并论证了“戏场与佛教的渊源以及向世俗戏场的转变过程”。文中的有些结论还可斟酌。康氏另文《“瓦舍”、“勾栏”新解》(《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探讨了瓦舍、勾栏的本义及演绎,并且论述了唐代戏场与宋代瓦舍、勾栏的关系。黄大宏《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对康文过分强调佛教因素提出了不同意见。应场《斗鸡诗》曰:“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二部分曹伍,群鸡换以陈。双距解长绁,飞踊超敌伦。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专场驱众敌,刚捷逸等群。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4页。王永平:《唐代长安的庙会与戏场——兼论中古时期庙会与戏场的起源及其结合》(《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一文,对戏场的起源有详细的论述。任半塘《唐戏弄》第6章之“一、剧场”对歌场、变场、道场、戏场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61—985页。

②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1页。

③ 《全唐诗》卷五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38页。

④ 郑紫:《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场”，是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①，既可以举行大型演出活动，也便于民众观看。这种戏场是面向大众的，对开拓城市社会公共空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 以贵族官僚为主要观众的戏场

皇帝在宫内或城楼陈百戏，如宣宗时，为表现“天资友爱，敦睦兄弟”，于大中元年（847）“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诸王无少长，悉预坐，乐陈百戏，抵暮而罢”^②。这种内部演出活动其实很多，似乎与大众文化娱乐活动无关，但参加演出的艺人和演出的内容很多也是民间“戏场”的主角^③。这些文化娱乐活动起到了沟通宫廷与民间社会的作用。

3. 寺院戏场

寺院作为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寺院戏场的开设就是其中之一。

寺院的戏场又分两种情况：

（1）寺院内设场

寺院内设戏场以唐朝长安城最为典型。长安佛教寺院最多时有一百多座。著名的大寺院，占地宽阔，环境优美，遍种名花异草，林木掩映，书画精妙，房舍充裕。高僧玄奘取经归来的译经场所大慈恩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④，假山池水相映，牡丹盛开时节，花团锦簇，京城士女观赏者趋之若鹜。这些著名寺院，通过俗讲、斋会、法事、节庆等活动，聚众效应非常显著。

《南部新书》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⑤长安城内设有戏场的寺院目前见于记载的有：晋昌坊的慈恩寺，新昌坊的青龙寺，开化坊的荐福寺，永乐坊的永寿寺，平康坊的菩提寺^⑥。但没有记载戏场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记载是否有固定的演出时间。只能推测，戏场应该设在寺院内的空场，观众有可能受到限制。如宣宗皇帝的女儿万寿公主到慈恩寺看戏，^⑦恐怕不会有众多普通百姓聚观的场面。另外，没有见到普通百姓进寺内观戏的记载。据史载，唐朝后期，长安戏场每天都有数千观众。如果长安人口以一百万计，若观戏人数以五千人计，则所占全城比例不过二百分之一。显然，这些戏场比起下面所述的动辄数万的街陌戏场相

① 勤政楼，全名勤政务本楼，花萼楼，全名花萼楼相辉楼，都位于兴庆宫南墙，南附大道，西南为东市，面向街市有比较宽阔的空间。

② 王说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证》卷一《德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18页。

③ 如《乐府杂录》中的琵琶第一高手——宫廷艺人康昆仑，经常参加民间的艺术表演；再如《全唐诗》中的既活跃于民间，又供奉于宫廷的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

④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2页。

⑤ 钱易：《南部新书》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7页。

⑥ 菩提寺在武宗会昌六年（846）改为保唐寺，参见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6—88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十二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6页。

比,观众群并不具有大众性。

有明确记载的设在唐长安寺庙的戏场,可以发现有几个共同特征:

一是都位于朱雀街街东区。如晋昌坊位于街东第三街,新昌坊位于街东第五街,开化坊位于街东第一街,永乐坊位于街东第二街,平康坊位于街东第三街。

二是寺庙在坊中的位置一般都靠坊外街道。唐制,寺庙允许向街开门,如慈恩寺占晋昌坊东“半坊之地”;菩提寺位于平康坊“南门之东”^①;荐福寺位于开化坊“半以南”^②;永寿寺位于永乐坊,该坊“西南隅,废明堂县廨。县东,清都观。观东,永寿寺”^③,应该也是位于坊南临街道的位置;青龙寺,位于新昌坊“南门之东”^④。

三是开设在寺庙的戏场,大概还没有成为固定的戏场,只是很多戏班经常在此开场演出。

(2) 寺院门前设戏场

长安城中寺庙的戏场是否有设在寺庙大门外的,不见记载,不好妄说。不过据记载,作为地方政治中心的州郡治所,往往设有临时大众戏场,常设的戏场一般选在重要寺庙大门外的广场,并且与宗教集会活动有关。如江南东道上元县(今南京)的瓦官寺,商人经常选择在此举办大规模的无遮斋^⑤,可聚集上万人。又如楚州龙兴寺^⑥,“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⑦。再如越州的宝林寺^⑧,观察使皇甫政因其妻陆氏入庙求子报验,遂亲设大斋,富商云集,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僧俗聚集达“百万之众”,“鼎沸惊闹”^⑨。那么,这些百万僧俗聚集的中心可能是寺前广场。由此联想到上揭长安寺院多邻街的现象,利用寺前空场作为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完全有条件和有可能的^⑩。

(3) 与宗教活动伴生的戏场

寺院举办的各种宗教活动,如斋会、俗讲,本来就带有表演性质,寺内外也常会有各种演出伴随其间,有的是寺院组织的,有的是民间艺人和艺术团体主动参与的,

① 《长安志》卷八“平康坊”条,第98页。

② 《长安志》卷七“开化坊”条,第85页。

③ 《长安志》卷八“永乐坊”条,第91页。

④ 《长安志》卷九“新昌坊”条,第118页。

⑤ 法事活动的一种,会期设有斋饭,普施僧俗信众。

⑥ 楚州,淮扬运河入淮处。

⑦ 《太平广记》卷三九四《徐智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48页。

⑧ 越州,唐州治会稽,今绍兴。

⑨ 《太平广记》卷四一《黑叟》,第259页。关于唐代的庙会请参见谢重光《唐代的庙会》,《文史知识》1988年第4期。

⑩ 都城的寺庙前空地的规模可能受到限制,暂且称为空场。

与下文所述的“街陌聚观”形成的戏场，聚众效应是同样的^①。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了一些开“俗讲”的寺庙，如街东崇仁坊的资圣寺、翊善坊的保寿寺、常乐坊的景公寺、平康坊的菩提（保唐）寺，街西金城坊的会昌寺、怀德坊的慧日寺等，都有可能搀杂着演出和娱乐活动，而且俗讲本身也越来越具有表演和娱乐性质。为争揽听众，佛道还展开竞争，大文豪韩愈为此作《华山女》诗，生动地描述了佛道二教举办讲唱时听众拥趸的盛况，记述了道观因有年轻貌美的华山女儿开讲，居然一扫座下“寥落如晨星”的尴尬局面，车马填塞道路，观内外挤满听众，后来者竟无处可坐^②。《因话录》卷四《角部》载：“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俗讲从形式到内容日益成为都市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才能吸引从普通士子到平康坊妓女的广大听众^③。

4. 街陌聚观

民间大众戏场最早的形式，应该是以“街陌聚观”的方式出现的。

《尚书故实》记载：“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④《太平广记》记载，陇西李僖伯，唐宪宗元和初往长安参加调选，居住在兴道里，某日“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⑤，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无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前，布幕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拏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幕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髑髅，金吾以其事上闻”^⑥。

这种街陌聚观的场面，表演者应该是流动艺人或流动艺术团体，负责京城治安的金吾卫并没有采取任何禁止或限制演出的措施，“上闻”何事没有说明，可能与演出

①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册《艺技篇》—“乐舞·戏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和王永平《唐代长安的庙会与戏场——兼论中古时期庙会与戏场的起源及其结合》（《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中都详细描述，请参看。

②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杳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骈骖塞路连辚辚。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簪脱钿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见《全唐诗》卷三四一，第3823、3824页。

③ 《北里志》是晚唐人孙棨所著，专门描写居住在平康坊的妓女生活。平康坊位于朱雀大街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道相望，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北里志》载“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④ 李绰《尚书故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6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73页。

⑤ 景风门，唐代长安皇城东城门。

⑥ 《太平广记》卷三四三《李僖伯》，第2722页。

涉及“恐怖”(髑髅)内容有关。如果以《太平广记》所记为实,至少在宪宗元和时期,主要街道的繁华地段(街衢或皇城城门外等),规模比较火的临时性戏场已经是常见之事,金吾熟视无睹,见之不怪。这种街陌聚观、围场演出应该已经成为长安城市居民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种戏场既不同于寺院内设的戏场,也不等同于在官府旨意下开展的以商业竞争为目的的“广较声乐”的“士女大和会”^①。不过,就观众层面看,士女大和会与街陌围场的观众群都是以普通市民为主,因此才会有《李娃传》中的一幕,郑生的父亲,身为堂堂的常州刺史,不得不“易章服,窃往观焉”的掩盖身份的举动。

这种面向大众的临时演出百戏场所,是利用了街衢的聚众量和流动性特点。这类临时演出也有不同情况:

一种是巡街式的表演,并不设场,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隋炀帝在洛阳主要街道“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戏场。唐朝每年上元灯节的全城“狂欢”,据《朝野僉载》卷三载:“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张祜有诗赞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②是把京城的主要坊市和街道当作一个大戏场。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在人群流动量比较大的主要街衢围场演戏。如上文所举《尚书故实》中的“街陌聚观”的“戏场”,以及《太平广记》所述皇城景风门外“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围成的“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同观的群众至少有上万人,负责治安的金吾只是将此事禀报上级,并未见采取任何行动。玄宗开元年间,“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寔以成俗”^③,禁而不止。

① 《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罩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赀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罩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盼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扇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第3988页。这种临时性的“广较胜负”,类似于街衢戏场,但性质属于商业竞争。

② 《全唐诗》卷五一—《正月十五夜灯》,第5838页。

③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1页。

泼寒胡戏，也属于街衢戏乐的一种。张说作《苏摩遮》，专门描述泼寒胡戏的场面^①；北宋陈旸记载：“大抵以十一月僦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②《容斋四笔》卷一五“浑脱队”：“赢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

第三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是因为政治目的或商业目的而举行的声乐赛事。典型的如《李娃传》^③和“康昆仑”^④参加的赛声乐，就是在主要街道的街衢处通过搭建彩楼（棚），展示经营物品开辟出一个临时的场。《李娃传》中描述了唐长安城有东西二凶肆（经营丧葬用品），经常采取展示卖品、角逐哀挽声乐的方式互较胜负，进行商业竞争。二肆长曾相约在天门街展示“佣器”以“较优劣”，当天“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西肆搭建“层榻”，东肆设置“连榻”，并各自派出歌手“广较胜负”。两肆以商业竞争为目的的竞赛演出，实际上在朱雀街形成了一个竞技表演和商业竞争的“场”。大致位置是在朱雀门外东西向的春明大街和金光大街与朱雀大街的街衢处。^⑤《乐府杂录·琵琶》也同样用生动的笔墨描述在因旱而皇帝下诏“祈雨”的活动中，东西两市市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场景，各搭彩楼，不惜重金各聘高手。《李娃传》中的“士女大和会”还是经过审批、官府认可的商业竞争和声乐角逐活动，有正式的程序和严格的规定，“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天门街即朱雀街，康昆仑所参加的广较胜负的场所应该与《李娃传》中举行士女大和会一样。《李娃传》记载，郑生之父为常州刺史，随计上京，闻知有士女大和会，“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说明这种与街陌聚观类似的街头演出还是不登大雅之堂，观众主要是普通市民，有身份者如郑生之父只能便装前往观看。

民间大众戏场有一个从临时围场演出到逐渐成为固定戏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城市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

三 “市场”的出现与“逢场作戏”

1. “市场”的出现

“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关系比较明确，但“场”进入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时间却比较模糊，“市”与“场”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乃至过渡到二者连用而成为集合

① 《全唐诗》卷八九，第982页。

② [宋]陈旸《乐书》卷一五八“乞寒”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29页。

③ 《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第3988页。

④ 《乐府杂录·琵琶》（《羯鼓录》等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⑤ 春明大街和金光大街的宽度大约为120米。

名词,大概也是在唐后期逐渐普遍化。

“市”与“场”连用目前看到的材料有几种情况:一是关、市、场、院等并列^①,一般是指相对独立的官府控制的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易的场所;二是如《中朝故事》卷下记载的李思齐,“每阅市场登酒肆,逢人即与相善”^②,这里显然已经将“市场”连用,是否是指同一场所还有待斟酌,但是指性质相同的场所是可以肯定的;三是官方在边境地区开设的商品交易市场,称为“和市场”,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四是“市场”与“戏”连用,《太平广记》卷八三记载,濮阳郡有名续生者,“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③。濮阳郡(濮州)属上郡(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二》载:“户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二,口四十万六千四百四十八,县五。”这里的“市”应该是州城的市,但诸处戏场,可能是市区中开辟的各类演出场所,也可能是指州城中的各类市场,都有临时演出场所,虽然不能详知,但说明戏场不止一处。^④

“戏场”和“场戏”,两者在使用时应该还是有区别的。“戏场”应该指专为演戏开辟或指定的场所,“场戏”有可能是指赶场时的临时演出。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官府每年三月一日向普通市民开放皇家园林“金明池”、“琼林苑”,作者生动描述了皇帝与民同乐的盛景:“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⑤这里的“作场勾肆”,显然只具有临时性质,最初瓦市的形成可能正是这样的场景。《东京梦华录》描述了开封城已经有了多处相对固定的瓦市,《梦粱录》则记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城的瓦市,大多数都在城外周边。瓦市、勾栏已经

① 《册府元龟》卷五〇四《关市》中,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太常少卿刘悦上言:“臣伏见买卖耕牛官中元无商税,近日关、市、场、院不禀勅文,悉是收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6053页。

② [南唐]尉迟偓撰。按:是书记载,李思齐为晚唐人。

③ 《太平广记》卷八三《续生》,第532页。如何解释“市场戏”三个字之间的关系呢?一是可将“市”作为一个独立的词,“场戏”两字作为另一个独立的词,可以解释为四月八日是固定的开市日期,有很多演出班子围场进行表演,因此,断句也可做“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更妥,否则“市场戏”连用似乎不通。二是将“市场”作为一个词,当时人已经有这种用法,如前所举,不过用“市场”修饰“戏”似乎少了些什么。三是这段描述可能有误,如果换成“市戏场处”,上下文可以呼应,似乎更通顺。孰是,因缺少相关材料,暂无法确定。

④ 上述的“市”,有可能是指固定的市,也有可能是定期开的不固定的“市”(因有“每四月八日”字样)。“场”,有可能是开市时临时设场,也有可能是利用原有的“场”临时交易;也有可能就是临时打场专做演出之用。“市场戏处”不知是否有脱字或衍字,似乎有些说不通。

⑤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3页。

是集戏场、卖场等功能于一身的固定的“场”。交易场所直接用“场”命名，成为普遍现象。如“杂买务”下设的“杂买场”，是购买官府所需物品的专卖场。“市”与“场”从相对独立发展为集合名词，应该是这两种空间最终重合的反映。

由此可知，随着市民阶层的成长，社会公共空间逐渐拓展，“市”、“场”这些公共场所逐渐面向大众，并向常年化和固定化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的“场”向多样化发展，如街衢、原官府控制或设置的各类场、皇家园林等，都成为可以临时“开场”的场所。

“场”的深入城市社会，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由唐到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逐渐扩大的趋势和过程，从市区发展到坊市街道并用，并向郊区扩展。郊区的皇家园林在对公众开放时，艺人商贩可以临时“作场”，罗列勾肆，那么城内外的瓦肆勾栏，实际上已经成为“作场”的常设场所。“逢场作戏”成语也就有了生成的基础。

2. “逢场作戏”的产生

“逢场作戏”现在的解释是：遇到一定场合，偶尔凑凑热闹。

但这句成语最初来源于唐朝艺人的“竿木百戏”，有学者考证为在“以鼓为主乐器的演出场”（临时性场所）上表演歌舞百戏^①；也有学者考察了“逢场作戏”用语中的佛教因素^②，如《景德传灯录》中记载：“师云：‘石头路滑。’”（邓隐峰）对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③再如《五灯会元》中记载：“僧问：‘逢场作戏时如何？’师曰：‘红炉爆出铁乌龟。’”^④等。戏场作为复合名词与佛教的关系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⑤。宋朝时，这个用语的出现和使用率的增加，与戏场从寺院走向社会，并成为大众观看演出的娱乐场所所有密切关系。

“逢场作戏”中的“逢”，有学者考证为鼓声^⑥，但成为一句成语后，更接近我们现在的用法。如：苏东坡《南歌子》：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⑦

孙惟信《水龙吟·除夕》：

小童教写桃符，道人还了常年例。神前灶下，祓除清静，献花酌水。祷告些

① 江巨荣《释“逢场作戏”》，《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② 康保成《“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禅宗仪式中的戏剧因素探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③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六《南岳怀让禅师第一世》，《佛光大藏经·禅藏·史传部》，台北，佛光出版社，1994年，第244、245页。

④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4页。

⑤ 康保成《“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⑥ 江巨荣《释“逢场作戏”》。

⑦ 唐圭璋编《全宋词》（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页。

儿,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诗写字,分数上面,略精进、尽足矣。

饮量添教不醉。好时节、逢场作戏。驱傩爆竹,软饧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鹊也、同添一岁。愿家家户户,和和顺顺,乐升平世。^①

也有学者认为“逢场作戏”在北宋中期已经成为一种盛行的观念,“表现了一些士大夫、僧人对社会、人生以及自我处境的看法”,蕴涵着玩世不恭、人生如戏的情绪^②。文人笔下频繁出现的“逢场作戏”中的“场”,应该是艺人依托于市(集)开场表演的场所,经营性的演出活动已经成为市集的重要组成部分。“逢场作戏”一词在宋朝成为俗语和成语,是有其社会背景的。首先是“场”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可以从事经济活动和文化娱乐的公共空间,二是大众化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经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随处、随需开场,某些临时的“场”分化为固定的“瓦市”,某些专门的“场”适应了城市公共空间扩大的需求和城市相对空间受到限制的现实。临时的作场与固定的瓦市,以及定期的大相国寺庙市,成为城市居民以及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就有了经常“逢场作戏”的可能,也就成了文人词中的带有调侃之意的常用语,抑或是演变成为一种观念,最终成为一句经典成语而被永久保留下来。

从“街陌聚观”到临时性的“逢场作戏”、“作场勾肆”,再到固定的瓦市,体现了政治与商业、商业与娱乐的巧妙结合。而这种结合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扩展进程中的“街”与“场”、“街”与“市”、“场”与“市”等不同空间的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市场”也逐渐成为一个固定搭配的集合名词,指向也往往是同一场所。

四 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与市民社会的成长

城市布局所占空间与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比关系。

据考古发掘,唐长安城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③,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由坊、市和街三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有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主要街道宽度都在70米以上,中央大道朱雀大街最宽处达155米^④。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街道、市区和

① 唐圭璋编《全宋词》(四),第2485页。

② 胡明伟:《“逢场作戏”蕴涵的人生教训和戏剧观念》,《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③ 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叶晓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2集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④ 唐代长安城外郭城的街道,就目前考古发掘实测,从20米到155米不等,请参看宁欣《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经常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寺观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社会公共空间，很多具有公共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包括官方和私人性质的活动）在这里展开。

北宋开封城主要是在后周世宗扩建汴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不绝。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①。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20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48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②，比唐朝长安城小了很多。按照周世宗扩建外城的原则，城内主要街道规定约30米宽，这与唐朝长安城的100多米宽的街道亦相去甚远，但城市人口的数量却多于长安，人口流动的频率也大于长安，空间的局限是显然易见的。“场”的演变，“逢场作戏”成语的形成，“市”与“场”成为集合名词，“市”与“场”逐渐合一，“市场”突破空间限制的发展，等，都反映了拓展社会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成长的需要，也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结果。我们探讨中国城市市民不断争取社会公共空间的过程，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程。^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五代宋初都市社会中下层研究”（10BZS057）的成果之一。

〔作者宁欣（女），195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13日

①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17页。

②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第251、252页。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③ 因有另文《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阐述了中国古代市民及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故本文不再赘述。